

## 第四章 夏丏尊的教育理念及實踐

馮開文在撰寫民國教育史時指出：「民國時期的教育頭緒繁多，變化複雜。受社會環境迅速變動的影響，教育思潮如浪如濤，教育運動風起雲湧，教育名家層出不窮。」<sup>1</sup>民初在學術理論和具體實踐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活潑氣象，而以夏丏尊為首的白馬湖作家群的教育實踐頗具代表性，陳星指出：「就白馬湖作家群的研究而言，如果把這個總課題的研究看做是一部交響樂，那麼他們之間親密無間、文學風格、藝術追求和教育、教學理念與實踐等等核心內容就是這部交響樂中的『華彩樂段』，而教育、教學理念與實踐則是這『華彩樂段』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少了它，樂段『華彩』不起來，而交響樂也就不甚精彩了。」<sup>2</sup>教育理念在這群作家的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層面，本章即針對夏丏尊所認為的教育本質及其實踐方式深入探究。

### 第一節 人本中心的健全教育

#### 一、受教材不等於受教育

五四運動與人的解放有密切的相關，陸玉芹指出：「『人』的解放問題，一開始就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對人的尊嚴、價值、個性與創造精神的肯定與張揚，成為當時先進知識份子的人生信條。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以說就是『人的解放』運動，是徹底否定一切束縛人的個性與才能的封建舊勢力運動。」<sup>3</sup>「人的解放」、「個性解放」等口號的提出，是五四時期知識份子覺醒和反抗傳統的重要標誌，而教育家們提倡「個性主義」、「發展個性」，以及以此為核心所提倡的學校教育改革，則為此創造了良好的文化環境。「這些教育主張和《新青年》所呼喚的『德謨克拉西』遙相呼應，和『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解放運動密切配合，對人們起到了啟蒙的作用。」<sup>4</sup>「個性主義」的口號促使教育家們探討學生個性發展的過程，以及如何發展學生個性等問題。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文化較其他先進國家落後，究因於中國過去是由家族結合而成的社會，個性主義較不發達，因此應該要尊重個人，學校應以個人和學生為本位，

<sup>1</sup> 馮開文：《中國民國教育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頁3。

<sup>2</sup> 陳星：《白馬湖畔話弘一》（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年5月），頁27-28。

<sup>3</sup> 陸玉芹：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人的解放，《鹽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頁81-83。

<sup>4</sup> 劉琪：中國教育的新生—五四文化與教育改革，收於丁鋼主編：《文化的傳遞與嬗變—中國文化與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11月），頁275。

發展其個性以養成健全人格，不僅要培養他為人才，更要培養他成為具有獨立精神的人。

1919年，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來華宣傳實用主義，主張「教育即生長」，不應為教育另立目的，教育本身就是目的。中國教育界許多有影響力的人物，如胡適、蔣夢麟、蔡元培、陶行知皆是杜威的學生，因此實用主義在中國產生了廣泛且長久的影響。杜威認為以往的教育是以教師為本位，以教科書為中心，只注意教材的傳授而不顧兒童本身的生活經驗、興趣及需要，僅僅是教師單方面的活動，學生則處於被動地位，學生的學習與其生活經驗脫節，則固有之才賦特長均不易自然且充分地發展，杜威因此主張：「把學科當作手段而不是目的；學校的中心目的在兒童的發展。」<sup>5</sup>他認為教育的措施應圍繞著學生而產生。蔡元培在《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也認為教育者應該「深知兒童身心發展之程序，而擇種種適當之方法以助之」，並且指出教育的真諦：「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sup>6</sup>其中「尚自然」、「展個性」也就是蔡元培主張以受教育者為主體的個性發展論。蔡元培認為教師必須不存成見，站在兒童的角度了解兒童，尊重其個性的發展，制定使其自由發展的教育方法，正如瑞士教育家佩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的理論：「昔之教育，使兒童受教於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於兒童」。

夏丏尊一再地強調：「我們所行的教育是人的教育，當然應當用人來做背景。」並引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之言：「不管學生將來入何等職業，先使他成功一個人。」夏氏認為：「現在普通教育中所列的科目，都是養成人的材料，不是教育之目的物，也不是學問。」<sup>7</sup>在學校課本上所學到的基礎知識固然是人類生活的必須，但若僅僅滿足於這個層次的知識，那麼僅能說是「受教材」，尚且談不上「受教育」。要由「受教材」提昇至「受教育」，還必須經過一段吸收轉化的過程，不光只是背誦、記憶的功夫，更重要的是必須經過思考與充分理解，並且在生活中驗證使之成為自身的一部分。夏丏尊指出：「中等學校教育的課程，只是一種施行教育的材料，從諸君方面說，是借了這些材料

<sup>5</sup> 陳峰津：《杜威教育思想之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27。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一書中表露他的兒童中心思想：「舊教育，兒童處於被動地位，教育的重心是兒童以外之教師、教科書及其他，即兒童本身直接之本能活動經驗以外之東西。此種教育，學校並非兒童生活之場所。今天教育的改革，是在於教育重心觀念的改變，這種思想觀念之改變，似同哥白尼的新發現，把宇宙的重心從地球移到太陽。在教育上，兒童變成了太陽，一切教育組織實施，環繞著他施行。」

<sup>6</sup> 蔡元培：《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蔡元培文集·卷二·教育上》（台北：錦繡出版公司，1995年5月），頁466。

<sup>7</sup> 夏丏尊：《教育的背景》，《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編印，1983年2月），頁321-324。

去收得發展身心能力的。諸君在中學校裡，目的應是受教育，不應是受教材。」<sup>8</sup>夏丏尊指出學生們往往只是盲目地研讀教材，囫圇吞棗地接受這些僵化的知識而不能得到教育的真義，真可說是買櫝還珠的愚笨辦法。

夏丏尊認為中學的教育環境旨在培養學生成為真正的人，「其中的學科都是些人類文化的大略的綱目，換言之，只是一個常識，在綜合地養成身心的能力上看來，不消說是好材料。」<sup>9</sup>然而這些材料並非接受教育的最後目的，他說：「所謂教育，就是能力給予的設計。學校就是為施行這設計的而特造的人為的環境。」又說：「所謂課程也者，無非施行教育作用的一種材料而已。」<sup>10</sup>夏丏尊認為中學生在學校裡受教育是為了「養成實力」，這種實力並非應付考試的能力，也不是賴以謀生的專業技能，而是一般身心上的能力，例如：「健康力、想像力、判斷力、記憶力、思考力、忍耐力、鑒賞力、道德力、讀書力、發表力、社交力等。」<sup>11</sup>中等教育偏於身心各種能力的養成，中學教育的性質「是借了教材給予能力的」。<sup>12</sup>這些在校中所學的能力看似抽象，卻是人生一切事業的基礎，由此可知夏丏尊之所以重視中學教育的原因。

「自由教育」是為了發展學生個性的一種教育實踐，也就是要改革舊有的「千篇一律」、「干涉束縛」的教育方式，進而尊重學生的自主權，它表現在知識自修、技藝自習、自律自訓及自治活動等方面，學校行政制度也充分給予學生自由參與的機會。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成為傳誦一時的名句，這個理論見之行動者，首先就是學生自治會的組織。1919年11月16日，浙一師成立學生自治會，「推行民主管理精神，培養學生自治能力，開創學生自治之先河，致杭城內外各學校學生紛起相繼仿效。」<sup>13</sup>春暉中學、立達學園也都有學生的自治組織，具體反應了時代的需求。1922年9月，《教育雜誌》上發行《現代教育思潮號》特刊，其中有幾篇介紹日本教育思想的論文，包括錢鶴的「日本現代教育之四大思潮」、楊賢江的「日本最近教育思潮概觀」以及祁煥森、劉叔琴的「日本自由教育說之介紹」各一篇，這些教育學說正是日本大正時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一種教育理論。其中劉叔琴曾在春暉中學及立達學園任教，因此不能忽略他與這群教師在教育理念上的互動。白馬湖作家群中，包括夏丏尊、豐子愷、方先燾、劉叔琴、章克標等人皆曾至日本留學，從這裡也可看出他們與同時代的日本教育思想某種程度的聯繫。魏風江說：「存在於春暉校園中的那種活潑生動的氣氛，

<sup>8</sup> 夏丏尊：《受教育與受教材》，同註7，頁281。

<sup>9</sup> 同註8，頁282。

<sup>10</sup> 同註8，頁280。

<sup>11</sup> 同註8，頁279。

<sup>12</sup> 同註8，頁283。

<sup>13</sup> 王艾村：《經亨頤與五四運動》，《廣東黨史》（2001年第6期），頁22。

是別的學校所見不到的。」<sup>14</sup>朱自清稱許夏丏尊為春暉中學所營造的學術氛圍：「他給學生一個有詩有畫的學術環境，讓他們按著個性自由發展。」朱自清在任教過程中感受到這裡的學生「對文藝和藝術的欣賞力和表現力都比別的同級的學校高的多。」<sup>15</sup>

1925年6月，立達學會的會員沈仲九在《教育雜誌》上刊載了關於中等教育之一種小小的試驗，文中作者將自由教育作為立達的教育思想重點，他說：「立達的創始者，深信教育應以發展個性為主要職責，而要發展個性，自由是必要的條件。」<sup>16</sup>從立達學園的行政組織可看出它努力實踐自由教育的梗概，立達學園不設校長，成員們認為：「『校長大人』的威嚴，我們領教得多了；這種制度的好處不是它特有的，而壞處倒有許多是獨到的，因此，我們決定革『校長制』的命。」<sup>17</sup>立達學園由導師、教師、職員、學生四部分共同組成，教師學生等選出代表若干人組成校務委員會，學校一切重大事務均由校務委員會討論決定，而後再交由相關部門執行，採取民主的方式治校。有民主才能談自由，立達主張：「自由是教育的必要條件，因為立達是主張個性發展教育的。」<sup>18</sup>從立達不稱學校而稱學園也可看出自由教育之義，他們認為「學校」兩字往往被視為「智識商店的化名」，不足以表示教育的真義，教育的真義是「引發」而非「模造」，教育者的責任是要讓學生自由發展，為其去害蟲、灌肥料及滋雨露，使其能就他的個性自然繁榮滋長。<sup>19</sup>這群教師們在這裡徹底實施自由教育，「立達在廢除校長制之後，又革了規則的命，立達沒有一切規則，而注重學生的自覺、自律、自治教育，以立自由之基礎。」<sup>20</sup>立達的校門可自由進出，圖書室由學生管理，實驗室可讓學生自行研究，食堂中男女同桌吃飯，這些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措施，使立達呈現出生動活潑的學風。這些措施是鑒於一般學校訂立規則反而帶來弊害及虛偽，匡互生認為：「劃一的規則，既有抹殺個性和養成虛偽的危險，而個人的行為因個性的差別，則有個別指導的必要。所以我們主張以個別訓練去代替劃一的規則。」<sup>21</sup>立達學園所實施的自由教育真正達到了發展學生個性的教育理想。

<sup>14</sup> 魏風江：在白馬湖時的匡互生先生，〈《春暉中學六十周年校慶紀念冊》（1981年12月），頁46。

<sup>15</sup> 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收於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頁460。

<sup>16</sup> 沈仲九：關於中等教育之一種小小試驗，收於《匡互生和立達學園教育思想教學實踐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頁133。

<sup>17</sup> 劉薰宇：立達中學校——它的創設現狀和未來的計劃，同註16，頁148。

<sup>18</sup> 章乃煥：中國教育史的光輝篇章——試論立達學園教育改革實驗的思想與精神實質，同註16，頁54。

<sup>19</sup> 匡互生：立達、立達學會、立達季刊、立達中學、立達學園，收於北京師範大學校史資料室編：《匡互生與立達學園》（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5月），頁29-30。

<sup>20</sup> 同註18，頁55。

<sup>21</sup> 同註19。

## 二、自學和自己教育

隨著西方與日本教育學說的不斷引進和廣泛傳播，五四前後的教育界開始注重研究學生的「學」，《教育雜誌》也接連介紹了「自習法」、「自動主義」、「學生本位主義」等一系列強調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新理論。1914年，「自學輔導法」傳至中國，這種教學法將學生自學與教師輔導結合，要求學生先自習教材，遇困難再由教師個別指導，旨在發揮兒童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避免由教師主導學習。學者認為所謂「自學」是指人類具有自我發展之能力，順其自然便可以發展自我之身心，所謂「輔導」是指教育者對於被教育者不採取注入式的教學法，而是尊重其自我發展之能力。1919年5月，陶行知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這是首次將民主思想與民主方法引進教育領域，如此便使學生從消極的教學受體轉變為自動的學習主體，將教學的民主權力極大程度地賦予了學生。<sup>22</sup>陶行知指出當時學校教育的弊病：「先生只管教，學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學的事體，都被教的事體打消掉了。論起名字來，居然是學校；講起實在來，卻又像教校。這都是因為重教太過，所以不知不覺的就將教和學分離了。」他認為教和學應當合一，他說：「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而在教學生學。」、「一方面要先生負指導的責任，一方面要學生負學習的責任。」<sup>23</sup>

五四時期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們追求民主教育，他們發揚教學民主的理念，促使教育方式產生了根本的變革。「從教的一方面來講，注重啟發式、生活教育、天才教育，反對灌輸、注入、教訓式、封閉式和整齊劃一；從學的一方面來講，提倡自學、自修、自動的研究和學生自治。」<sup>24</sup>在夏丏尊的教育理念中，鼓勵學生「自學」是很重要的一環，也因為主張自學和自己教育，所以他對傳統灌輸式的教學法抱持反對的態度。夏丏尊強調啟發學生自覺性的重要，主張學生應是教學過程中的主體，他認為學生：「不能只像一只開著口的布袋，專等教師們把一切應該學的東西一樣一樣裝進來，也必須應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思索這一樣，練習那一樣，才可以成為適應環境的『變通自在的藝人』。」<sup>25</sup>夏丏尊注重學生主動學習的工夫，從學生賈祖璋的一段描述可以看出梗概：「當時印發的選文教材，沒有斷句，更不分段。上課時丏尊師就隨便指定一位同學讀斷句子。讀錯或讀完了一段，指定另一位同學再讀。全文讀完，再指定同學分段講解。同

<sup>22</sup> 參見李燕：「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語文教育的民主化科學化」，《浙江學刊》第122期（2000年6月），頁153。

<sup>23</sup> 參見李杏保、顧黃初，《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頁16。

<sup>24</sup> 同註4，頁277。

<sup>25</sup> 夏丏尊：「自學」和「自己教育」，同註7，頁314。

學們常恐點到名，讀不斷，講不好，因而上課前總先認真預習。」<sup>26</sup>這種啟發式的教學法在立達學園實施得尤其徹底，「他們絕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更反對『鑄模式』，即無論什麼功課，都用同一模式去鑄造。他們採取『誘發』，讓學生自己思維，自由討論，自己研究，以養成科學的頭腦。」<sup>27</sup>

中國傳統的灌輸式教育是當時的學者所共同擯棄的，胡適認為：「『學之為言效』就是『國渣』，應當去掉，教育學生是要教他創造，不是要教他效法。」<sup>28</sup>陳獨秀也說：「被動主義灌輸主義的教育，不顧學生的心理狀態，只拼命教去，教出來的人物，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鸚鵡一般，依人作解，自家決沒有真實見地，自動能力」<sup>29</sup>夏丏尊尤其反對教師單方面的傳遞知識，他說：「求學，就是要學要問，我講你們聽是學；你們提問就是問。若是學而不問，只得個一知半解，淺薄無聊。」<sup>30</sup>這與孔子的教育理念相合，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sup>31</sup>夏丏尊主張啟發誘導學生，反對直接向學生灌輸知識，而要注意學生自覺性的原則，學生必須自覺的運用思考能力才能舉一反三，他說：「人可以牽牛到水邊去，但除了牛肚渴要飲水的時候，人無法使牛飲水，強灌下去，牛雖不反抗，實際上在牛也絕不受實益。」<sup>32</sup>由此可知倘若學生不自覺，再精敏的教師亦無用武之地。夏丏尊頗有感觸地說道：「學問要學生自求，人要學生自做。我們以前種種替學生謀便利的方案，都可以說是強牛飲水的愚舉。最要緊的是促醒學生的自覺，學生一日不自覺，什麼都是空的。」<sup>33</sup>教育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針對學生的心理特點，引發其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必須避免單向的傳遞，由此可見夏丏尊確實掌握了教育的要義。

---

<sup>26</sup> 賈祖璋：《夏丏尊師和開明書店的科學讀物》，收於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上海：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頁49。

<sup>27</sup> 郭人全：「立達」的教育思想、「五四」精神的貫徹，同註16，頁39。

<sup>28</sup> 轉引自黎潔華：《杜威在華年表》，《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5年第1期）。

<sup>29</sup> 陳獨秀：《近代西洋教育》，收於仁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頁324。

<sup>30</sup> 徐伯璠：《五十六年前幾位授業老師的片斷回憶》，同註14，頁31。

<sup>31</sup> 見《述而第七》，《論語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刊本），頁61。

<sup>32</sup> 夏丏尊：《近事雜感》，同註7，頁347。

<sup>33</sup> 同註32。

### 三、新村意識的勞動教育

在二 年代，許多知識分子接受俄國民粹派的理論，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到民間去」運動，李大釗、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人紛紛投身於各種形式的農村改良運動，擔負起教育民眾的責任。他們的目標是向民眾學習並且教育民眾，「這一方面是因為民間文化中蘊藏的大量珍寶函待開掘，而知識分子也需要從中找到超越自我的模式；另一方面，青年學生也要提高農民的知識文化水準，改善他們的生活方式。」<sup>34</sup>這些知識分子要求自己能與民眾相結合，期許自己的學問能為民眾所用，冀求能夠弭平兩者之間的鴻溝，這確實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民間文化運動。這群知識分子於對在春暉及立達辦學的教育志士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夏丏尊對春暉中學便有著這樣的期許：「你是生在鄉間的，鄉村運動，不是你本地風光的責任嗎？」<sup>35</sup>而立達學園也在他們的努力下，進行規模更大的平民教育，由此可見這群教育家深耕民間的用心。

就在「到民間去」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之時，周作人從日本引進新村思想，這與「到民間去」運動的精神是相貫通的，而夏丏尊等人在春暉及立達的教育實踐也更加貼近新村運動。所謂的「新村」是 1918 年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在日本九州日向所建立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地。<sup>36</sup>「他們受托爾斯泰的影響，以人道主義為主張，以『和平』和『無抵抗』為標誌。」<sup>37</sup>新村的目的是：「使全人類協同而營『人的生活』，要使全人類大家去走人的正道，要使一切的人從衣食住的憂慮中解放出來，在世界上竭力發揮人類的光榮，確立對於人的不動信仰。」而新村的精神是：「勞動不是為金錢報酬，是人類的義務。勞動則需要協同，需要愛，自愛和他愛，對於同心同德的人，不能愛如兄弟者，不配作新村裡的人。」

<sup>34</sup> (美)洪長泰著，董曉萍譯：《到民間去—1918-1937 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年 10 月)，頁 296-297。這場運動的中心內涵乃是尋找一種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存在的持久生命力特徵，雖以民間做榜樣，實則是試圖為新世紀勾畫一個發展的藍圖。參見蘭愛國：《到民間去—九十年代文學的主潮》，《文藝評論》(1995 年第 5 期)。

<sup>35</sup> 夏丏尊：《春暉的使命》，《春暉》第 20 期(1923 年 12 月)。

<sup>36</sup> 新村思想是無政府主義的一支。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由於缺乏真正的社會實踐能力，所以本質上是一種空想的、唯意志的理想主義，儘管無政府主義本身有著很濃厚的烏托幫色彩，但它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描繪仍吸引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興趣，周作人對新村思想的嚮往即是一例，他所提出的「個人本位主義」就是一種基於人道立場的理想主義，他企圖建立一種以「愛」為核心的烏托幫生活。周作人所提出的這個觀念影響了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五四前後文研會的成員都有著普遍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五四時期的無政府主義矛頭主要指向封建主義，但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其理論與實踐上的極端性、片面性日漸顯露出來，因此在中國的路便逐漸走向盡頭。參見李相銀：《論五四文學與無政府主義的關係》，《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2 期)，頁 76-80。

<sup>37</sup> (日)岡野辰之著，蔣明玳譯：《中國現代作家與日本文學》，《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3 年第 12 期)，頁 138。

人斷不可失「愛」、「正義」、「勇氣」三件。」<sup>38</sup>1919年7月，周作人曾親自走訪日向新村，他回到中國後，「成為中國新村運動最積極的鼓吹者與組織者。」<sup>39</sup>周作人在宣傳的文章中反覆申明：「新村的理想，簡單的說一句話，就是人的生活。」<sup>40</sup>也就是物質與精神、肉與靈的調和，同時還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統一。他認為新村的精神是提倡協力的共同生活，「各人須盡對於人類的義務，又能享個人的自由」，是「以協力與自由，互助與獨立為生活的根本。」<sup>41</sup>並且在北京組織了新村支部，也就是「工讀互助團」。

陳星認為：「在研究白馬湖作家的教育理念時是一定要把勞育列入其中的，因為他們中間的主將夏丏尊、匡互生等都是積極提倡勞育的。」<sup>42</sup>經亨頤早在浙一師便有新村的實驗，當時有一些學生成立第一及第二勞動團，宣稱「勞動神聖」，自覺地在學校裡參加各種公益活動。而附屬小學的教師也試行新村制，其中的幹部皆由民主選舉產生。<sup>43</sup>經亨頤在《春暉中學計劃書》曾經提到對春暉中學的期許：「校長與各專任教員，不但應與學生同寢共食，且須實行以身作則。人人有勞動之責，如洗濯、炊事、購物、灑掃、庭園作業等，均由教員、學生合組勞工會分任之。任免教員之標準，即能勞動、能研究二語。」<sup>44</sup>足見經亨頤對勞動教育的重視。

朱自清在《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中提到：「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遠的理想，可並不是空想，他少年時傾向無政府主義，一度想和幾個朋友組織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沒有實現。」<sup>45</sup>在白馬湖時期，夏丏尊曾翻譯一篇介紹勞動思想的文章——日本的一燈園及其建設者西田天香氏，該文介紹日本幾位具宗教情懷的社會改革家，一燈園中的生活方式為：「未明即起，掃除室內畢，一同靜坐，隨了值日者讀經。朝餐（菜食）後，各自到被囑託處托鉢，或製造麵包，或教育兒童，或替人寫帳，或看護病人，或替人商量辦理雜事，或幫助農民

<sup>38</sup> 王錦厚：《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學》（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10月），頁91-92。

<sup>39</sup>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9月），頁229。周作人陸續寫了許多宣傳新村的的文章，例如《訪日本新村記》載於《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10月）《新村的精神》載於《覺悟》（1919年11月23-24日）《新村運動的解說—對胡適先生的演說》載於《晨報》（1920年1月20日）《新村的理想與實際》載於《晨報副刊》（1920年6月23-24日）。

<sup>40</sup> 周作人：《新村的理想與實際》，《藝術與生活》（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7月），頁425。

<sup>41</sup>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同註40，頁418-419。

<sup>42</sup> 陳星：《教改先鋒—白馬湖作家群》（台北：幼獅文化事業，1996年12月），頁166。

<sup>43</sup> 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浙江近代著名學校和教育家》（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頁100。

<sup>44</sup> 經亨頤：《春暉中學計劃書—受上虞陳春瀾先生之委託》，收於張彬編：《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頁179。

<sup>45</sup> 同註15，頁460。



耕作，至晚各歸到這一燈園的道場來。」<sup>46</sup>西田天香這種以「有德的勞役」換取食物的態度是夏丏尊所讚許的。

夏丏尊在春暉任教時，「在他當時的言行中，雖沒有明白鮮明地提出『新村』一詞，但其實質，無疑與『新村』理想合拍。」<sup>47</sup>他期許春暉的師生們能致力於「鄉村運動」，也就是幫助不識字的鄉民認字、增設文理農科、師範科等職業科、以精神力量戰勝物質困頓等，這些都反映他的新村思想。當時友人看見春暉中學有農田，且有幾個學生在車水的景象好生奇怪，夏氏便笑著解釋：「學生是要樣樣學學」，<sup>48</sup>在夏丏尊的教育理念中，藉由勞動可以使學生達致身心健全的目標。這種思想在匡互生身上更是根深蒂固，他們的辦學理念也代表這群教師們的共同追求。

匡互生，字日休，1891年生於湖南邵陽東鄉長沙村。1919年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時成立「工學會」，實行半工半讀，這是他重視生產教育的思想基礎。五四運動時，第一個衝入趙家樓，打開曹汝霖宅第大門讓愛國遊行隊湧入，成為火燒趙家樓、嚴懲賣國賊的英雄人物。1920年任湖南第一師範教務主任，與當時同在該校任職的夏丏尊成為好友。匡互生有感於學校教育對社會影響的緩慢，因而去職進行新村運動的實驗，他最初在杭州上緯埠試驗，後來又轉到宜興凌家塘，但兩次皆因經濟困難而中止。1924年應夏丏尊之邀至春暉中學擔任訓育主任，提出教育目標：「學校教育必須把勞心勞力結合起來，把學生培養成具有遠大理想、高尚品德、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以及具備生產勞動的技術才能，具有良好體魄的人。」<sup>49</sup>在匡互生的觀念中，「改造社會和人性，根本在於改革農村教育，他堅信這麼一個信念。於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他接受了新村運動主張。」<sup>50</sup>

朱光潛指匡氏在春暉中學時，「和無政府主義者有些來往，特別維護教育的民主自由。」<sup>51</sup>魏風江說：「匡先生在春暉時，原定創辦一個農場，設立農科。」<sup>52</sup>可惜匡互生的這個理想在春暉中學並未實現，於是他轉到立達學園繼續實踐。他們認為：

<sup>46</sup> 夏丏尊：日本的一燈園及其建設者西田天香氏，《東方雜誌》第20卷第20號（1923年9月），頁61。

<sup>47</sup> 同註42，頁155。

<sup>48</sup> 夏一吾：我所知道的夏丏尊先生，《曹娥江》（1986年6月），頁31。

<sup>49</sup> 同註42，頁156。

<sup>50</sup> 趙海洲、趙文健，《匡互生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10月），頁85。

<sup>51</sup> 朱光潛：回憶上海立達學園和開明書店，同註19，頁119。

<sup>52</sup> 魏風江：從春暉中學到立達學園的匡互生先生，同註19，頁154。

人類最高貴的一點靈光就是排除一切障礙而求實現理想的一種意力。這種意力要用刻苦耐勞去培養。我們立達的師生一方面要極力過簡樸的生活，使精神不易為物質欲所屈服；一方面要實行勞動，每日費若干時間，到工場農場去做工。我們堅信勞動可以養成刻苦耐勞的習慣，可以使我們領略創造的快慰，可以使我們能獨立生活，不完全為社會上的消耗者。<sup>53</sup>

立達學園特別注重生產勞動教育，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中最基本的活動，也是正常社會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活動，「生產教育的目的在於通過生產實踐使學生養成刻苦耐勞的習慣，進而領會人類生活的意義。」<sup>54</sup>這既是修養健全人格的必要條件，對於貫徹實行立達宗旨，即實行互助生活，促進文化，改造社會各點都是必要的。儘管有關夏丏尊新村勞動思想的文獻資料相當有限，然從他與匡互生從湖南一師、春暉中學到立達學園皆是志同道合的同事看來，夏丏尊對於這個教育理念無疑是贊同的，或許在具體實踐上他並非主要的領導者，但他確實扮演了輔助的角色，在他們的共同理念中，實施勞動教育是健全人格教育的重要方式。

---

<sup>53</sup> 匡互生、朱光潛：《立達學園旨趣》，同註16，頁109。

<sup>54</sup> 蔡端：《匡互生和立達學園》，同註19，頁171。

## 第二節 真誠摯愛的感化教育

嚴家炎認為五四作家的人生哲學中，很具代表性的一派是：「以冰心、王統照、葉紹鈞、夏丏尊等為代表的作家，積極主張以『愛』和『美』的哲學來喚醒人生、溫潤人生、彌合人生、改造人生。」<sup>1</sup>夏丏尊充滿教育愛的形象已為世人所熟悉，他呵護、關懷青年們的具體事蹟，在友人及後輩的回憶文章中處處可見，這也是筆者探討其教育理念的直接資料。本節將從真誠摯愛的教育本質，以及人格感化的實踐方式探討夏丏尊的情意教育。

### 一、教育的本質—愛的教育

「愛的教育」一詞幾乎與夏丏尊畫上等號，這與他翻譯《愛的教育》一書有直接的關係。在白馬湖居住的時期，夏丏尊利用課餘之暇翻譯《愛的教育》，這是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1846-1908）的作品，夏氏根據日文版著手翻譯。《愛的教育》原名「考萊」（Cuore），在意大利的本意是「心」，日譯本書名為《愛的學校》，因書中內容不僅止於學校，還涵蓋了家庭及社會，於是夏丏尊在翻譯時根據內容起新名為《愛的教育》。原書 1904 年在世界上已達三百版，各國幾乎都有譯本。夏丏尊的譯作首先在《東方雜誌》連載，獲得各方的好評。他在 1924 年翻譯完畢，初版時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再版則改由開明書店印行，各中學紛紛將此書作為課外輔導讀物。夏丏尊後來又翻譯了孟德格查的《續愛的教育》，作者原名及生卒年未詳，僅知是亞米契斯的畏友。《愛的教育》是感情教育，是軟教育，而《續愛的教育》寫的是意志教育，是硬教育，據夏氏所言，前者具有多量的感傷性，而後者則含有較多的興奮性。《愛的教育》在中國發行後盛行不衰，迄 1949 年再版四十多次，風行中國數十年，迄今在大陸仍有「愛的研究會」對此研究不輟。

葉至善指出：「一部翻譯小說，跟譯者的名字聯繫得如此之緊，在讀者的印象中竟超過了作者，這樣的現象是極少見的。究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夏先生立意之誠。」<sup>2</sup>夏丏尊在序言中說道：「記得曾流了淚三日夜讀畢，就是後來在翻譯或隨便閱讀時，還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覺眼睛濕潤。這不是悲哀的眼淚，乃是慚愧

<sup>1</sup> 嚴家炎認為五四作家對人生哲學地看法大致有三：除了上述一派，另外兩派分別是以文學研究會廬隱、淺草—沉鐘社林如稷、創造社郁達夫等為代表的傷感、厭世、苦悶、徬徨的傾向。還有一派帶點道家、佛家的色彩，主張任其自然，反對人為的剪裁壓制，坦然迎接命運的考驗，但還是積極編織人生的網，雖遇風雨也不消沉氣餒，以許地山、俞平伯為代表。參見嚴家炎：《論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與知識結構》，《現代中國》（2001 年第 1 期），頁 9。

<sup>2</sup> 葉至善：《紀念夏丏尊先生》，收於夏弘寧主編：《夏丏尊紀念文集》（浙江：浙江省上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2001 年 10 月），頁 215。

和感激的眼淚。」<sup>3</sup>他認為自己平日為人為父及為師的態度，讀了此書就像是醜女見了美人般難堪，因而慚愧地流下眼淚。他感慨道：「書中敘述親子之愛、師生之情、朋友之誼、鄉國之感、社會之同情，都已近於理想的世界，雖是幻影，使人讀了覺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為世界要如此才好。」<sup>4</sup>朱自清道出夏氏翻譯此書的心理：「他翻譯這本書，是抱著佛教徒了願的精神在動筆的，從這件事上可以見出他將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這也正是他的從事教育事業的態度。」<sup>5</sup>

夏丏尊從《愛的教育》一書反觀中國的教育現況，慨歎當時的學校教育只是從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馬燈似地變更迎合，但教育生命的重要的元素卻從未有人顧及，他設喻論理：

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於池的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麼？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sup>6</sup>

由於當時行政管理者和施教者見識的淺陋，視變異為改革，視變動為進步，滿足於現象的五光十色卻忽略了探究事實的本源。的確，沒有水的池不是池，沒有感情的教育也不是教育，充其量只是無生命的教育。夏丏尊的教育精神無疑也影響了他周圍的人，朱自清認為理想的教育當是如此：

第一先須有溫熱的心，能夠愛人！須能愛具體的這個那個的人；不是說能愛抽象的『人』。能愛學生，才能真的注意學生，才能得學生的信仰；得了學生的信仰，就是為學生所愛。那時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沒有說不通的事；感化於是乎可言。<sup>7</sup>

當時師生關係的疏離讓夏丏尊頗為感慨，他認為從前學校制度未興，師生關係是自由的，學生因佩服某先生的才識而不憚千里負笈前往，學生們「從」的精神便足以達到教育的效果。後來學校制度已經普遍，師生關係由運命安排而非自由選擇，加上教師們都是從「教匠製造廠」般的師範學校培育出來，在這樣的條件下，「要使學生做到那『從』字樣的心悅誠服的精神是不容易的事情，於是學校教育

<sup>3</sup> 夏丏尊：《愛的教育》譯者序言，《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編印，1983年2月），頁42。

<sup>4</sup> 同註3。

<sup>5</sup> 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收於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頁461。

<sup>6</sup> 同註3。

<sup>7</sup> 朱自清：《教育的信仰》，同註5，頁143。

就空虛了！」<sup>8</sup>除了感慨學生對師長不懂得尊敬，教師力量的微薄也讓他有著深深的無力感，他說：

教師對於學生所應取的手段，只有教育與教訓二種：教育是積極的輔助，教訓是消極的防制。這兩種作用，普通皆依了教師的口舌而行。想要用口舌去改造學生，感化學生，原是一件太不自量的事，特別地在教訓一方面，效率猶小。可是教師除了這笨拙的口舌，已沒有別的具體的工具了。<sup>9</sup>

正如夏氏所言：「教育在某種意味上可以說是英雄的事業，真摯就是英雄的事業。」<sup>10</sup>夏丕尊以一貫的真誠態度從事教育工作。他曾記錄友人所寫的一副對聯：「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作先生。」並表明當時的教師生活真不是件有趣的事，然而他卻有著這樣的抱負：「與其畏縮煩惱的過日，何妨堂堂正正的奮鬥，用『死罪犯人打仗』的態度，在絕望之中殺出一條希望的血路來。」<sup>11</sup>從他對教育工作的執著，我們可以感受到夏丕尊所謂英雄事業的真意。

夏丕尊認為教師和學生的關係不僅僅是知識傳授的關係，教師不是販運知識的商人，知識不是商品，學生也不是顧客，教學過程也絕不是商人把貨物送到客人手中的過程，倘若如此，這種知識是毫無用處的。他說：「真正的教育需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知識不過人格一部分，不是人格的全體。」<sup>12</sup>這也就是教書育人的觀點，夏丕尊指出：「教育是教師與學生合作的事，教師雖施著正當的教育，學生如果無接受的熱心，也不會有好結果。」<sup>13</sup>夏丕尊一生奉行「愛的教育」，雖然在督促學生的課業上，他是位嚴厲的師長，但在關心學生的身心和品德方面，則像一位慈愛的長輩。他在春暉中學任教時，學校實施自己選擇導師的制度，他對擇定自己為指導教師的學生說過這樣一段情意懇切的話：「你們選我作指導師，我很高興，你們就把我作為義父吧，你們遠離家庭，寄讀學校，學習上、生活上必然碰到許多困難，我作為指導師，有責任為你們排憂解難，你們相信我吧！一切由我負責。」<sup>14</sup>學生也確實將他視做可信賴的長輩，師生關係情同父子。夏衍說道：「讀他的文章，看他的待人和處世，他的愛心之深，真可以說是『菩薩心腸』。」<sup>15</sup>

<sup>8</sup> 夏丕尊：近事雜感，同註3，頁348。

<sup>9</sup> 夏丕尊：讀書與冥想，同註3，頁35-36。

<sup>10</sup> 夏丕尊：回顧和希望，同註3，頁346。

<sup>11</sup> 夏丕尊：無奈，同註3，頁44。

<sup>12</sup> 夏丕尊：教育的背景，同註3，頁324。

<sup>13</sup> 夏丕尊：受教育與受教材，同註3，頁281。

<sup>14</sup> 沈乃福：紀念丕師 辦好春暉，同註2，頁267-268。

<sup>15</sup> 夏衍：憶夏丕尊先生，同註2，頁205。

## 二、教育的方式—感化教育

「人格感化」指的是教育者以自身的品德和情感陶冶學生，即透過教育者本身豐富的學識、良好的德行，以及對受教者真誠的關心愛護來引發學生的敬慕之情，以此觸動、感化受教者，使其觀念及行為導向正確的軌道。夏丏尊倡導人格教育，強調教師身教的重要性，他認為教師必須有相當的人格，被教育者才能心悅誠服，單靠外在的規矩是靠不住的。他說：「人格恰如一種魔力，從人格發出來的行動，自然使人受著強大的感化。同是一句話，因說話者人格的不同，效力亦往往不同。這就是有人格的背景與否的分別。」<sup>16</sup>夏丏尊認為學校並非學店般僅有知識的傳授，學生也不像器件只有被加工塑造的職能，真正的教育必須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與夏氏理念相合的匡互生也認為：「我是相信人格教育的，我覺得青年教育應當以教育者的人格作中心。雖然我們不能希望青年教育者個個都具有絕頂偉大的人格，而有使頑石點頭的魔力；但有了相當的修養，一定有相當的結果，這確實可以保證。」<sup>17</sup>

夏丏尊在浙江兩級師範任教時與李叔同結識，夏氏認為這位「畏友」的人格力量是令人佩服的。當時的李叔同仍未有出世之想，夏丏尊指出：「我們那時頗有些道學氣，儼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夠。可是所想努力的，還是儒家式的修養，至於宗教方面簡直毫不關心的。」<sup>18</sup>李叔同是中國開藝術教育風氣之先的人士，當時浙江兩級師範學校由於他任教的關係，竟將圖畫和音樂看得比其他科目重要，學校中的圖畫教室和音樂教室設備齊全，學生們課外時間練習這兩科的時間比其他科目都勤，豐子愷形容：「下午四時以後，滿校都是琴聲，圖畫教室裡不斷的有人在那裡練習石膏模型木炭畫，光景宛如一藝術專科學校。」<sup>19</sup>夏丏尊指出：「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後光，故能令人敬仰。」<sup>20</sup>所謂「人格的背景」就是以高尚的情操、過人的才情以及深厚的學養作基礎，昇華為具感召力的精神氣質和人格魅力。有人格作背景自然能使學生心悅誠服，能於潛移默化之中影響學生的人格、志趣，甚至影響學生的人生志業。豐子愷於 1914 年入浙一師讀書，正是由於李叔同及夏丏尊兩人言傳身教的感化而擇定藝術作為終身努力的方向，終成為著名的漫畫家及散文家。

<sup>16</sup> 夏丏尊：《教育的背景》，同註 3，頁 324。

<sup>17</sup> 匡互生：《青年教育者的修養》，收於《匡互生和立達學園教育思想教學實踐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121。

<sup>18</sup> 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同註 3，頁 245。

<sup>19</sup> 豐子愷：《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第二卷）》（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年 6 月），頁 541。

<sup>20</sup> 豐子愷：《悼丐師》，同註 19，頁 156。

夏丏尊曾經指出李叔同做人的一個特點是「做一樣，像一樣。」<sup>21</sup>夏氏為文記載如下的事件：當時宿舍失竊財物難以查實，時任舍監的夏氏求教於李叔同，李叔同要他出一布告，勸作賊者速來自首，如三日內無自首者，足見舍監誠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但此這話須說得誠實，三日後如沒有人自首，真非自殺不可。李叔同這些話是出自真心，毫無虛偽之意，但夏氏自愧不能照行。夏丏尊說：「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師生以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誠敬中發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學他。」<sup>22</sup>王統照認為：「他們的性情迥異，然卻無礙為超越一切的良友。」<sup>23</sup>正由於彼此性格上的差異互補，但他們共同矢志於教育的理念，遂使兩人惺惺相惜，情誼日漸深厚。豐子愷說明李叔同「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內心感動，自然誠服。」學生們非常的敬怕他，但夏氏「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們便樂於與他親近。豐子愷描述這樣的景象：「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阿！』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他，敬愛他。」李叔同與夏丏尊對待學生的態度迥異，但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是相同的，豐子愷說：「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sup>24</sup>

夏丏尊被稱為「媽媽的教育」還可以從他《緊張氣氛的回憶》一文所記載的情景一探究竟。夏氏回憶在浙一師擔任舍監時常有學生與他為難，但他抱持著不顧一切的決心與他們應對。在飯廳裡，若有學生遠遠地發出「噓噓」的鼓動風潮的暗號，他便站到凳子上去找尋發出這聲音的究竟為何人，若人叢中有人喊打，他便答：「我不怕打，你來打吧！」學生無故請假外出他必不答應，寧願與其爭論一二小時才止。每晨起床鈴一搖，他就到各齋舍去視察，未起床者就一一叫起，夜間自習時間喧擾者，立刻前去制止，熄燈後有私點洋燭者，立刻進去沒收...。他說：「我不記學生的過，有事不去告訴校長，只是自己用一張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應付。」<sup>25</sup>他每天起得甚早，睡得甚遲，兢兢業業地做好舍監之職，甚至遠超過一般舍監所負之責。鄭振鐸說：「他的對待學生們從來不採取嚴肅的督責的態度，他只是懇摯的誘導著他們。」<sup>26</sup>鄭氏憶起當時有些同學在熄燈點名

<sup>21</sup> 豐子愷：《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同註 19，頁 541。

<sup>22</sup> 同註 18，頁 245。

<sup>23</sup> 王統照：《丏尊先生故後追憶》，同註 2，頁 53。

<sup>24</sup> 同註 20，頁 158。

<sup>25</sup> 夏丏尊：《緊張氣氛的回憶》，同註 3，頁 168。

<sup>26</sup> 鄭振鐸：《悼夏丏尊先生》，收於夏弘寧編：《白馬湖散文隨筆精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365。

之後溜出校門，夏氏察覺後並未加以責罰，只是懇切的勸導，一次兩次不見效，夏氏便每夜地守候著，等到學生深夜返回宿舍才安心，即使學生屢犯他仍不加任何處罰，只是一再苦口婆心地勸導，總要使得犯過者真心悔過而後已。豐子愷說：「學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管，同母親一般愛護學生，學生也像母親一般愛他，深知他的罵是愛。因為他的頭像木瓜，給他取個綽號叫做夏木瓜，其實不是綽號，是愛稱。」<sup>27</sup>由此也可看出師生之間情意的真摯。

白馬湖作家群們在春暉中學也是以「愛」為教育的宗旨，「摯誠、摯愛與人格感化是春暉同仁在教育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們對自身教育教學理念與實踐的第一要求。」<sup>28</sup>春暉中學的校歌由豐子愷譜曲，採用唐代詩人孟郊《遊子吟》一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詩的原意是以陽光撫育小草的比喻來歌頌母愛的偉大，由此也可見春暉中學以愛感化學生的用意。春暉中學的學生張林嵐憶道：「夏先生主張人格教育，影響所及，春暉廢除了任何形式的體罰和不尊重人格的管理方式。」<sup>29</sup>學生黃源也說：「教師都是有真才實學，對待學生，有一個共同特點，不以訓斥而以感化為主，頗受學生擁護。」<sup>30</sup>除了夏丏尊，在春暉中學擔任訓育主任的匡互生同樣實施感化教育，「他決不主張用記過、開除等懲罰辦法，至於體罰更是嚴厲禁止使用。他主張跟學生以談心的方式，互相交換意見，務必使犯錯誤的學生自己認識到錯誤，決心痛改前非。」<sup>31</sup>徐伯璠形容匡氏：「當時在教育界興起感化教育的高潮，先生是信奉者，身體力行，不但教育上從不責罰學生，總是循循善誘，而且普及到生活上。」<sup>32</sup>並且以「苦行僧」稱之。匡互生對教育的看法很能代表春暉中學的教師們，他說：「教育這件事，父母對子女也好，老師對學生也罷，我看還是大禹治水的辦法，是疏導，不宜採用鯀的堵塞。老師對待學生的淘氣、缺點，是怨惡，不是嫉惡。」<sup>33</sup>當時某位同學品行不佳，成了同學中的害群之馬，好些人主張將他開除了事，惟夏氏獨排眾議，自願擔任這位同學的導師，喻之以理，動之以情，終於使那位學生幡然悔悟。一次查到學生聚賭，夏丏尊與朱自清等人商量，決定先找主事的學生談話，敦促他們了解自己的錯誤。在詢問的過程中，教師們首先責怪自己沒有教育在先，未能防患於未然，感到有負自己

<sup>27</sup> 同註 19，頁 541。

<sup>28</sup> 陳星：《豐子愷新傳—清空藝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61。

<sup>29</sup> 張林嵐：《紀念之外的紀念》，同註 2，頁 243。

<sup>30</sup> 黃源：「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老師匡互生，收於北京師範大學校史資料室編：《匡互生與立達學園》（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 5 月），頁 144。

<sup>31</sup> 斯而中：《匡互生在春暉中學》，同註 30，頁 150。

<sup>32</sup> 徐伯璠：《五十六年前幾位授業老師的片斷回憶》，收於《春暉中學六十周年校慶紀念冊》，1981 年 12 月，頁 35。

<sup>33</sup> 趙海洲、趙文健：《匡互生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95。



的職責和學校家長的託付而流下內疚的眼淚，學生見此情狀，對於自己的行為有違師長的期望也流下悔恨之淚。教師們認為如此教育的目的已然達到，於是將處理的全權交予學生協治會，待其做出懲罰的決定後，教師們自願罰一個月的薪水，並且伴著學生們作處罰的工作，這樣的教育方式完全是從愛護學生的角度出發的。

白馬湖畔這群愛的教育探索者因無法實現理念而轉移陣地，在立達學園繼續實踐以真誠摯愛為主軸的教育。立達的校徽是一個幼童擁抱紅心，紅心的中央作綬帶狀的人字，人格感化可從立達旨趣窺一究竟：

我們的學校純粹由同志的教師、信仰的學生組成，一方面要具有社會的組織和互助的精神，一方面要充滿了家庭的親愛。大家都欣合無間，極力求由敬愛而發生人格感化。...我們師生大家都極力求以至誠相見，免除一切虛偽，要使社會對於立達的師生所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誠懇的態度。<sup>34</sup>

在校園中幾乎是人手一冊《愛的教育》，師生與員工之間的感情親近，立達學園重自律而非他律，因為他們認為靠外力勉強行善容易流於虛偽，「他們希望學生自覺『善』的價值而行善，他們不以規則箝制學生，他們不以懲戒恐嚇學生，他們不以威嚴壓迫學生，他們不以空論訓斥學生；規則懲戒這種東西，在立達是不能存在的。」<sup>35</sup>他們認為增進學生的自律心及自律力「當用『感化』而不用『強制』，用『人格』而不用『規則』，以『漸』而不以『驟』，從『細微』入手而不專從『顯著』。」<sup>36</sup>匡互生說明立達學園的訓育工作：「『本校對於學生的操行，注重人格感化。凡形式的獎懲，繁瑣的規則，一概不用。』這是立達中學簡章上所規定的條文，也就是立達導師、教師的一致的主張。」<sup>37</sup>一次，立達學園的藝術科曾僱用寫生模特兒，有些好奇的學生趴在窗戶上窺視，夏丕尊對他們說中國一句老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進一步闡述：「美是一門學問，也是一種情操，要學習，要培養，才能發現，才能懂得。發現美，懂得美，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最高的情操；否則的話，美醜不分，是一生中最大的醜惡，最大的悲哀。」<sup>38</sup>夏氏對學生喻之以理後，學生也能明理而後自律，感化教育確實發揮了效果。

「夏丕尊先生的長衫」是說明他實踐愛的教育時常被提起的，夏丕尊在南屏女中任教時，經常穿一件舊的藍布長衫，挾著白布包著的書籍講義，一路顛簸

<sup>34</sup> 匡互生、朱光潛：立達學園旨趣，同註 17，頁 108。

<sup>35</sup> 沈仲九：關於中等教育之一種小小試驗，同註 17，頁 143。

<sup>36</sup> 同註 35

<sup>37</sup> 匡互生：立達、立達學會、立達季刊、立達中學、立達學園，同註 30，頁 26。

<sup>38</sup> 蔡瑞：匡互生教育思想淺介，同註 17，頁 43。

著到校，學生們總會事先為他搬好軟椅、泡好茶、準備好粉筆，逢熱天還搶著為他打扇，若課排在第一節，學生們必定會提前在校門口迎接，前後簇擁著夏丏尊進入教室。有一次，學生們想為他做件新長衫，知道若直接提出必定遭到婉拒，於是以演戲需要道具做藉口向他借用，按舊長衫的尺寸大小，全班同學一齊動手，一針一線親手縫製，趕在教師節那天，用紅綠絲線將新長衫包裝好放在講台上，由班長向夏丏尊說明原委，他才恍然大悟地笑了起來。同學們要求夏丏尊趕緊穿上試試，夏氏笑吟吟地，像一位慈父般聽任孩子們擺佈。<sup>39</sup>學生說他「笑容滿面，跑遍了所有的教員休息室，讓所有的同事看看他的新裝。」教職員們露出敬慕的眼光，夏氏不斷發出讚嘆：「合身極了，多麼稱心，多麼美好的新衫！」<sup>40</sup>這件長衫已超過它表面上的價值，一針一線交織著師生之間真誠可貴的情誼。

夏丏尊認為：「理想的教師應當把真心裝到口舌中去」，<sup>41</sup>他以自己一顆拳拳之心面對青年學子，傅彬然說道：

夏先生教學生不用權威，不敷衍，也沒有別的什麼特別方法，只有至誠、嚴正、真率、坦白八個字。他一面教學生，一面自己學。教得認真，學得起勁。他惟恐對不起學生，對不起自己。假如一定要說夏先生教學生有什麼方法，那麼，從第三者看起來，夏先生所用的方法是「人格感化」的方法。<sup>42</sup>

夏丏尊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葉聖陶說：「夏先生當教師，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用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在教師的立場上，可以說已經抓住了對人對事兩項的要點。」<sup>43</sup>夏氏可說是一位真正的人師，他關懷、同情後輩，其慈厚的長者形象根植於學子心中，唐弢於是贊道：「作為教育家，他自己便是『愛』的全部的化身。」<sup>44</sup>

---

<sup>39</sup> 陳仁慧：夏丏尊先生在南屏女中，同註2，頁156。

<sup>40</sup> 呂紹華：夏丏尊先生的長衫，收於陳信元編：《懷念夏丏尊專輯》（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1月），頁30。

<sup>41</sup> 夏丏尊：讀書與冥想，同註3，頁36。

<sup>42</sup> 傅彬然：怎樣才對得起夏先生對得起自己，《中學生》第176期（1946年6月）。

<sup>43</sup> 葉聖陶：中學生社同人，《中學生》第175期（1946年5月）。

<sup>44</sup> 唐弢：從絢爛轉向平淡，同註2，頁233。

### 第三節 革新取向的語文教育

#### 一、新文化運動與語文教育制度

為了反抗尊孔復古的封建逆流，主張改革的知識分子們以陳獨秀主編之《新青年》為主要陣地，掀起一場新文化運動。他們高喊民主和科學的口號，舉起新文化運動的兩面大旗，發出了語文改革的呼聲。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八不主義」，<sup>1</sup>大力鼓吹白話文寫作。接著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sup>2</sup>將胡適的文學改良推向了文學革命。這場風潮得到了一些學者的響應，錢玄同與劉半農等人連續撰文，痛斥駢文散文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認定白話文才是文學的正宗，肯定白話文作為文學工具的價值，主張打破舊文體的迷信，而曾攻訐白話文為「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的林紓也在這場論爭中敗退，繼承林紓的章士釗、梅光迪也終被提倡白話文的浪潮捲沒，改革者的呼聲讓許多文化教育界人士注意到統一國語的問題。改革者迎擊了復辟倒退的逆流，建樹了豐碩的思想文化，對於語文教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科學與民主的思想指示了語文教育的革新方向，文學革命、國語運動推動了語文教育的發展。」<sup>3</sup>當時國語運動的口號是「國語統一、言文一致」，而這也是語文教育革新的主要目標。

除了文壇興起一場革命，在教育界也興起了不小的改革聲浪。「五四運動促使了教育改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推行國語運動，即白話文運動，將白話文著作引進中小學語文教材，從而使語文教學的內容及和方法產生了巨大的變化。」<sup>4</sup>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將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為「國語」，並分期將文言教科書廢止，重申國語要旨：「在使兒童學習普通語言文字，養成發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啟發其德智。」並且提出教授注音字母、讀本採取語體文等說明，這是語文教育史上一項重大改革。胡適認為教育部此一命令是「幾十年來第一件大事」、「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sup>5</sup>1923年6月，新學制

<sup>1</sup> 八不主義：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言俗語。該文雖是向文學方面所提出的建議，但也可算是對白話文寫作的一般要求。

<sup>2</sup> 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不僅是文學形式的改革，而是將文學革命當作開發文明、改變國民性的利器。

<sup>3</sup> 吳樹仁：「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語文教育，《上饒師專學報》（1995年第4期），頁41。

<sup>4</sup> 陳必祥編：《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雲南：雲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頁43。

<sup>5</sup> 胡適：《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胡適文存（第一卷）》（台北：遠東出版，1953年），頁255。黎錦熙曾在《教育雜誌》第13卷第2號上發表《國語教育上應當解決的問題》，說明「國文是死的東西，國語是活的東西」，「現在小學校裡不用國文，創行國語，確是我國文化上的一大進

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刊布了《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至此語文教育產生了根本性的改革，初步實現了從文言文到語體的轉型，此綱要完整地提出了小學、初中到高中語文學科的性質、教學目的及任務、教學原則、教學內容、分階段教學要求及畢業最低限度等，是我國語文教學史上第一個以現代教育學為理論依據，體系較為完整的語文學科課程標準，為語文教育的科學化奠定穩固的基礎。二 年代對中小學的語文教學進行大規模的改革與研究，奠定了中國語文教學體制的基礎，這也回過頭來促進新思想的傳播，如前所述，1915 年以《新青年》雜誌首倡「文學革命」，1918 年以後《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稿全部改用白話文寫作，至此「國語統一」便與「文學革命」實現「雙潮合一」。<sup>6</sup>

## 二、「動」的語文教學觀與實踐

五四運動以前的國文教學仍因襲傳統的方式，也就是先要求學生背誦課文，然後在熟讀的基礎上逐步領會字詞、篇章的涵義，意即「讀書百遍，其義自現」的方式。照搬原來文言文教學的方法肯定不適合於白話文的教學，那麼白話文教學應該如何走出困境並開拓新路？鄭國民指出：「當時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的一些人，逐漸意識到只有與現代教學理論相結合，才能解決這個問題。」<sup>7</sup>也只有如此，白話文教學才能突破傳統文言文教學方法的束縛，重新建構適合自身特點的教學模式。當時具有進步思想的教師們亟欲改變現狀，李燕說道：「吸收了國外教育教學理論和方法後的教育界人士精神大振，他們為了讓在封建思想桎梏中艱難起步的中國語文教育能走向更輝煌的明天，為了改變國文教學的落後狀況，明確地提出了教育『科學化』的建議，科學地研究語言的自身規律，以促進語文教學科學地發展。」<sup>8</sup>夏丏尊積極從事語文教育的革新，對於教育的變動抱持樂觀的態度，他說：

我想現在的教育界，平心講來，也究竟還沒有完全上正當的軌道。不過從本學年起，已經有了一個「動」字，「動」得好，固然最好沒有了；「動」得不好，也不該就抱悲觀，因為「動」總比以前的「不動」好得多。天下

---

步。」

<sup>6</sup> 本來國語運動可叫做「文字改革運動」，其目的是「為教育的」，是用國語為「開通明智」的工具，雖提倡白話，但不廢古文。文學革命運動是「為文學的」，提倡白話，並攻擊古文為死的文學。然因文學革命運動是從「文的形式方面」著手，要求語言或文體的解放，因此國語統一運動也給文學革命運動增加不少助力。參見王玉：《文學研究會與新文學運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頁 55。

<sup>7</sup> 鄭國民：《從文言文教學到白話文教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205。

<sup>8</sup> 李燕：「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語文教育的民主化科學化」，《浙江學刊》第 122 期（2000 年 6 月），頁 153。

本來不應該有「完全無缺」的事，逐漸改動，就是漸與『完全無缺』接近的方法，固滯不動，那是沒有藥醫的死症！<sup>9</sup>

教學法的革新反映了時代變動的事實，「民主科學的思想激活了死氣沉沉的語文教學課堂，一批具有先進的改革思想的教師在教育教學第一線，廣泛地進行了新的教育教學方法的實驗研究。」<sup>10</sup>夏丏尊指出：「從前的教育界的空氣何等沉滯！何等黑暗！經過了『五四運動』以後，從前底『因襲』、『成規』，都受了一種破產的處分，非另尋方法重立基礎不可。」<sup>11</sup>夏氏認為一味地保守因襲，只會產生不合時宜、阻止進步的流弊，他指出：

教育家雖然不能促進時代，改良境遇，斷不可違背大勢而誤人子弟。已經這個時候了，還要去講春秋的大義，冕旒的制度，教人讀《李斯論》《封建論》的文章，出《岳飛論》《始皇論》的題目，學少林、天台派的拳棒，使學生變成半三不四的人物，學了幾年，一切現在的制度，生活上應有的常識，仍舊茫然。<sup>12</sup>

夏氏痛斥當時的教育家只求博古，不屑通今，教育界完全是尊古卑今的情況，導致「十幾歲的學生一動著筆便是古者如何，今則如何，居然也有『江河日下，世風不古』的一種遺老的口吻。」<sup>13</sup>這可說是教育不合時勢的餘毒。

「『五四』時期，浙江一師大膽進行革新，不但是當時全省文化思想革命的中心之一，而且，成為全國語文教育改革的重要障地。」<sup>14</sup>校長經亨頤主張辦教育必須不停頓地探索前進，革故鼎新，在教育上採取「與時俱進」的辦學方針，他比較動與靜的教育態度：「教育者瞻前而不顧後，即靜的態度也；瞻前而同時顧後，則可謂動矣。不但維持文化，尤當改造文化；不但傳達文化，尤須增進文化。僅曰維持，僅曰傳達，靜的態度也。由維持而加以改造，由傳達而益以增進，則可謂動矣。」<sup>15</sup>強調變動、改動可說是五四時期教育家的共識。浙一師成為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經亨頤也被稱為浙江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經亨頤為了革新國語教育，特聘陳望道、劉大白與李次九，加上夏丏尊四人共同發起有關白話文教育的實驗與改革，因為他們積極推行新文化運動而被譽為『四大金剛』。

<sup>9</sup> 夏丏尊：一九一九年的回顧，《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編印，1983年2月），頁329。

<sup>10</sup> 同註8。

<sup>11</sup> 同註9。

<sup>12</sup> 夏丏尊：教育的背景，同註9，頁323。

<sup>13</sup> 同註12，頁324。

<sup>14</sup> 顧黃初：《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頁103。

<sup>15</sup> 經亨頤：動學觀與時代之理解，收於張彬編：《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頁187。

在語文教學方面，經亨頤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他將文言文比喻成鼎彝瓶鏡之類的擺設品，而將白話文比喻成杯盤碗盞等日常必需品，他說：「入人家室，堂上無鼎彝瓶鏡猶可，廚下無杯盤碗盞可乎？不可。今日學校中之教授國文，是欲以鼎彝瓶鏡而代杯盤碗盞之用。」因此他一再強調：「改造文化，增進文化，必自文字始」。<sup>16</sup>在經氏「與時俱進」的理念支持下，四大金剛在語文教學上有許多革新之舉，首先，他們反對傳統思想，主張以民主和科學反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專制，當時浙一師的國文教材，大多選自《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刊物上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及魯迅等人的作品。他們將國文教學目的確定為：「使學生能夠了解用現代語，或近於現代語如各日報和中等學校以下科學教科書所用的文言所發表的文章，而且能夠看得迅速、正確、貫通，並使學生能夠用現代語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sup>17</sup>《一師校友會十日刊》說明：「改革我國的文字，教育人確已認為必要了，在本校地位上看來，更覺得不能不負提倡的責任。所以，從這個學年起，本校和附屬小學國文科的授課一律改用白話。」<sup>18</sup>

其次是傳授注音字母，這是普及白話文的首途，陳望道特地向吳稚暉請益，並傳授給全體職員和學生。出版國語叢書也是他們實現語文革新的方式，他們編輯《新式標點用法》、《國語法》及《注音字母教授法》等書。此外，他們還對國語教授法進行研究，擬定國語教授法大綱，編制新的國語教材，規定：「以和人生最有關係的問題為綱，以新出版各雜誌中關於各問題的文章為目。」<sup>19</sup>就在浙一師進行國文改革的次年，北京教育部訓令將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科」改為「國語科」，並且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由此可知「在國文教學改革的問題上，浙江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面。」<sup>20</sup>學生傅彬然憶道：「夏先生教我們國文，在五四運動之前三四年，他對於語文和文學的見解，與後來五四運動時候陳胡諸子『文學革命』的主張多半吻合的。」<sup>21</sup>王嘉良清楚地點明：「浙江作家固有的『叛道』傳統和敏於新變的精神，使他們在新舊文學的激烈交戰中很快確立自覺的『現代』文學觀念，在『五四』文學革命中顯示出開拓新路的潛能。」<sup>22</sup>

<sup>16</sup> 同註 15，頁 193。

<sup>17</sup> 同註 14，頁 104。

<sup>18</sup> 夏弘寧：《夏丏尊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51。

<sup>19</sup> 同註 18，頁 52。

<sup>20</sup> 張彬：《從浙江看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1 月），頁 229。

<sup>21</sup> 傅彬然：「怎樣才對得起夏先生對得起自己」，收於陳信元編：《懷念夏丏尊專輯》（台北：蘭亭書店，1986 年 1 月），頁 54。

<sup>22</sup> 王嘉良：「浙江潮」與「五四」新文學運動，《浙江學刊》（2000 年第 6 期），頁 134。

十九世紀初，西方現代教育理論紛紛介紹至中國，「到『五四』之後，教學過程中注重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調動學習的主動性等理論已得到廣泛的傳播」<sup>23</sup>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界開始進行語文教學法的各項實驗。浙一師的國文教師們在杜威據問題的反省思考性質所擬定的「五段教學法」啟發下，<sup>24</sup>設計了新的教學法。「杜氏在教學法上之貢獻，乃是倡導『問題教學法』，是為啟發思想，使兒童主動思考，主動學習促進研究發展之有效方法。」<sup>25</sup>杜威強調「思考與反省」在生活與學習中之重要性，故一切的學習必須在思考中進行，運用思考從經驗或實驗中探究問題、解決問題，這樣的學習過程才能使學生有所發現與發明。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白話文教學分為 10 個步驟：

- 1.說明要學生研究的問題；
- 2.回答學生關於教材的問題；
- 3.訓練學生分析文章的功夫；
- 4.學生擬出問題的提綱；
- 5.將提綱寫成札記；
- 6.口頭發表，由師生共同評議；
- 7.學生輪流上台演講；
- 8.學生從不同的觀點互相辯難；
- 9.教員總結學生的觀點，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 10.批改學生的書面札記。<sup>26</sup>

他們將白話文引進國文教材，嘗試一種以問題為主的教學法，即在講授白話文的過程中，由教員先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再由學生自行分析綜合，最後師生相互質疑、共同討論以求得答案。這種教學法的特點在於注重教學雙方共同研討的過程，打破了傳統國文教學信息單向流通的封閉狀態，並以所提出的問題為紐帶，

<sup>23</sup> 同註 7，頁 206。

<sup>24</sup> 問題教學法是杜威等人所倡導的，杜威根據反省思考的性質，主張教學過程應分為五個步驟，亦可稱為杜威「五段教學法」，即（1）疑難或問題的發覺（2）確定問題或疑難之所在和性質（3）提出許多假設為可能解決方案（4）推理假設所應適用的事例（5）最後為證實，若無法證實，則重新推理。參見陳峰津：《杜威教育思想之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97。

<sup>25</sup> 同註 24，頁 160。

<sup>26</sup>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白話文教學分為 10 個步驟的教法：（1）說明：每星期或兩星期教員提出一個研究的問題，將關於本問題的材料分給學生，並指示閱覽的次序，如學生不能全閱，可指定專閱幾篇。（2）答問：學生對於教材文字和意義，如有不明瞭的地方，應詢問教員。（3）分析：學生每看一篇文章應先用分析的功夫，分析的次序如下：1.把每篇文章分成幾大段，每段定一小標題。2.把一大段的大意再分析起來，用簡括的文章記載出來，這是做一篇大綱的次序。（4）綜合：學生把各篇文章看完後，應對於一問題用綜合的功夫。綜合的次序如下：1.把各篇大段的標題，分別同異，同的合併起來，異的另立標題。2.就各小標題的同異，把全問題分做幾大段，挨次分定了幾個小標題。3.把各篇中對於小標題的意見，用簡括的文章記載出來，這是做一問題的大綱。（5）書面的批評：學生做好大綱以後，應該把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用文章表示出來做成札記。（6）口頭的批評：學生做好大綱批評以後，教員隨便取幾個學生的大綱和批評發表出來，請各學生發表批評，教員又就學生口頭的批評，隨時批評。（7）學生講演：教員請各學生輪流在講台上講演一問題的大綱和批評。（8）辯難：教員學生得提出一問題的甲乙兩說，請各學生認定贊成哪一說，兩方互相辯難。教員應隨時加以判斷，並得參加意見。（9）教員講演：教員講演分兩種：1.把各生札記的內容分別統計一下總批評。2.教員自己對於一問題的意見。（10）批改札記：札記的字句，如有不妥的地方，教員應加改削。原資料載於《教育雜誌》第 12 卷第 2 號，此乃轉引自潘新和：《中國現代寫作教育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0 月），頁 109-110。

將聽說讀寫有機地結合，重視能力的綜合訓練。這種方法意在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啟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引發學生鑽研的動機，在教學過程中儘量讓教師處於被動的地位，充分展現了教學民主的精神。學者對這種教學法褒貶皆有，贊成者認為這是一種可以發達學生思想的辦法，反對者則認為這簡直像在開學術演講會或問題討論會。姑且不論問題教學法的成效如何，浙一師的白話文教學程序在當時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樣的實驗確實對白話文教學的深入研究產生助益。

清末以來，浙江學界「風潮」迭起，學潮發生的主因是：「在新教育、新思潮的影響下，學生的民主思想開始萌發，自主意識得到增強。他們開始用新的眼光來審視學校的教學和管理，用新的標準來評判校長和教師的行為，矛頭直指封建舊教育的遺規、流毒。」<sup>27</sup>而浙一師也因堅持新思想而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風潮。在校長經亨頤和「四大金剛」的帶領下，五四運動思想啟蒙的效應迅速擴展到浙一師校園，學生施存統、汪壽華等人成立「全國書報販賣部」與「書報販賣團」，在校內外推銷《新青年》、《星期評論》等新式刊物，繼而出版《浙江第一師範校友會十日刊》、《浙江第一師範十日刊》、《浙江第一師範學生自治會刊》、《浙江新潮》及《錢江評論》等報刊，其中以《浙江新潮》的影響最大。<sup>28</sup>學生們在這些刊物中表現個人對傳統道德重新思考的領悟，並且嘗試新文藝的創作。夏丏尊是這些刊物的支持者，姜丹書道：「民國八年冬，學生自治會出刊物，每編竣，須送稿受審於先生。」<sup>29</sup>而這場風暴直接導因於這些刊物中所載的新思想。

浙江每年春秋兩季皆須舉行祭孔典禮，省長及教育廳長皆會參加，身為浙江教育會長兼浙一師校長的經亨頤是主要陪祭者。1919年秋，受新文化影響的浙一師的學生們紛紛表示不願參加祭孔，此舉獲得經亨頤的全力支持。11月7日，施存統在《浙江新潮》第二期發表《非孝》一文，主張在家庭中應以平等的愛代替不平等的孝道，該文送至夏丏尊處審閱，夏氏未作刪改便准予印行。浙一師的師生們先是不願祭孔，後又抨擊孝道，這前後兩個事件使浙江政府當局視浙一師的新思想為洪水猛獸，於是省長公署發文教育廳立即查辦。政府當局認為浙一師的學生之所以敢如此大逆不道，必定有教師在背後支持，於是令校長解聘四大金剛，並開除學生施存統，但皆為經亨頤所拒絕，政府於是調轉砲口，決定撤換校長。教育廳長利用寒假學生返家之機，免去經亨頤的校長職務，師生聞訊紛紛提前返校，要求教育廳收回成命，是為轟動一時的「留經運動」。浙江政府竟

<sup>27</sup> 同註 20，頁 206。

<sup>28</sup> 《浙江新潮》是「浙江新潮社」出版的刊物。該社主要成員有浙一師的施存統、俞秀松、曹聚仁與省一中的阮毅成、查猛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的沈乃熙（夏衍）、謝錦文、汪馥泉等合辦。由於施存統在第 2 期發表《非孝》後便遭查禁，被迫遷到上海出版，不久停刊。該刊存在時間不長，但在新文化運動中影響很大。

<sup>29</sup> 姜丹書：《夏丏尊先生傳略》，同註 9，頁 6。



然調動警察加以鎮壓，並揚言要解散學校，終於引發一場學潮。經過師生們的據理力爭，加上各界的輿論支持，浙一師終於取得這場保衛新文化運動的勝利，然而經亨頤此時卻表明再不願留任，不久後經氏與夏丏尊等「四大金剛」紛紛離校，這也就是 1920 年震撼全國的「一師風潮」。這場風波引發多方關注，看似單純的校長及教師的去留問題，背後卻隱含著新舊文化之間的衝突，學潮的演變也代表著維新與傳統兩種勢力的消長。

### 三、真實的態度--作文教學改革

五四運動之前的作文皆採用文言文，對於作文的指導主要分為三方面：一是多讀範文，透過大量的閱讀、背誦以增加語感，從而學會寫作；二是揣摩、模仿範文，即經過教師講解某篇文章的起承轉合及文體特點後，對照古文仿寫；三是多寫，也就是熟能生巧。<sup>30</sup>基本上仍是承襲古代私塾教學的傳統模式，寫作教育沿著舊的軌道作慣性的運行。當時國文教育在讀寫形式上並未產生根本性的轉變，所讀的是文言文，作的也還是文言文，然而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引進語文教材，中小學都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因而白話文的作文法又成為語文教學中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夏丏尊在作文教學的革新促使語言文字進行新舊替換，他為新文學的普及作了紮實的奠基工作。

豐子愷回憶夏丏尊在浙江兩級師範的作文課上，學生們在過去的學習過程裡已作慣《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等文題，夏氏突然要求他們做一篇《自述》，並言明「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某學生寫父親客死他鄉而「星夜匍匐奔喪」，夏氏苦笑著問：「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又有學生讚美隱遁，說道：「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氏因而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夏氏這種實事求是，力戒矯揉造作的作文教學法讓學生們感到驚奇而折服，好似長夢驚醒，恍悟今是而昨非。<sup>31</sup>這其實就是「修辭立其誠」的道理。同為四大金剛的陳望道在《作文法講義》的序言中也說：「對於作文的態度，作者反對技巧主義、情緒主義，提倡今後作文自然應該以『力求真實』，就是力求吻合事象為基本的態度。」<sup>32</sup>夏氏在《文章作法》中提出作文的首要條件是真實和明確，要做到這一點，須自己造詞，勿漫用成語或典故，注意符號和

<sup>30</sup> 同註 4，頁 70。魯迅曾描寫這種學習方式：「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讀，做，讀，做；做的不好，又讀，又做。他決不說壞處在哪裡，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魯迅：《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魯迅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頁 632。

<sup>31</sup> 豐子愷：《悼丏師》，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第二卷）》（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年 6 月），頁 157。

<sup>32</sup> 陳望道：《作文法講義》序（上海：民智書局，1922 年 3 月）。

分段，並在用字上注意。他也強調作文態度的重要，要使文章能適合讀者的心情，技巧的研究原是必要，然而態度的注意卻比技巧更加要緊，他說：「技巧屬於積極的修辭，大部分有賴於天分和學力；態度是修辭的積極的方面，全是情理範圍中的事，人人可以學得的。要學文章，我以為初步先須認定作文的態度。」<sup>33</sup>

夏丏尊鼓勵學生留意生活的週遭，蓄積寫作的材料，他說：「寫作是一種鬱積的發洩，猶之爆竹的遇火爆發。教師所命的題目，只是一條藥線，如果諸君是平日儲備著火藥的，遇到火就會爆發起來，感到一種鬱積發洩的愉快。」<sup>34</sup>葉至善解釋夏丏尊所謂的「鬱積」並非發牢騷、圖痛快之意，而是「一切所見所聞所感所思的層層積累。」<sup>35</sup>夏丏尊鼓勵學生：「從讀過的書裡，從見到的世相裡，從自己的體驗裡，從朋友的談話裡，廣事吸收。」若自己平日不隨處留意，臨時又懶得去蒐集，那麼遇到題目就只能勉強敷衍幾句，如此「猶之不會爆發的空爆竹，雖用火點著了藥線，只是『刺』地一聲，把藥線燒畢就完了。」<sup>36</sup>這是從學生的角度出發的，當然，教師也必須思考學生在題目劃定的範圍內是否有所「鬱積」，題目出得恰當，學生才能將所見所聞所思發而為文，因此教師命題時必須考量到學生是否有找到材料的可能。教師若命題得當則可以讓學生學得捕捉題材的方法，能夠學得蒐集材料的本領，更可以養成寫作各種文體的能力。

夏丏尊在春暉中學的作文教學很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理念，他進行四方面的改革：<sup>37</sup>第一，夏丏尊認為正確的作文的態度必須考慮「六個 W」，也就是學生作文時要思考六個問題：為什麼要作這文？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麼？誰在作此文？在什麼地方作此文？在什麼時候作此文？怎樣作此文？以上這些問題包含了為文的目的、中心思想、作者地位、應用環境、時代觀念和方法等核心問題。第二，提倡「實新小」，培養好文風：「實」指的是內容要充實，感情要真實；「新」是要學生發揮創造力，反對模仿和抄襲；「小」是要學生寫身邊的人和事，從二、三百字至千字以內的短文練習起。第三，重視觀察，寫出特色：為了使學生寫出內容充實且風格獨特的文章，夏丏尊特別重視學生觀察能力的培養，具體教導學生如何觀察、抓住特徵及選擇角度等。第四，在實踐中學習：聽、說、讀、寫四方面充分結合。當時校刊《春暉》上登載校長談話以及名人專題講話多由學生紀錄，在夏氏的鼓勵下，學生寫作的熱情高漲，原先師生合辦的《春暉》已不能滿

<sup>33</sup> 夏丏尊：《作文的基本的態度》，《夏丏尊文集·文心之輯》（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編印，1983年12月），頁99。

<sup>34</sup> 夏丏尊：《關於國文的學習》，同註34，頁538。

<sup>35</sup> 葉至善：《給爆竹安上藥線——夏丏尊先生論「命題作文」》，《中學語文教學》（1986年6月），頁3。

<sup>36</sup> 同註35。

<sup>37</sup> 同註14，頁144。

足學生寫作的需求，學生又自辦《春暉學生》和《白馬嘶》等刊物。還有不少學生向《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投稿。語文教學改革是當時春暉中學教育革新的中堅部分，為此校的發展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夏丏尊在南屏女中任教時，認真批改作文的態度讓學生十分感念，學生呂紹華說他：「尤其注重作文的批改，先生每次批改以後，總是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當面指導，指出習作中的優缺點，並因人而異地予以啟發誘導，對學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使學生樂於習作，成績進步迅速。」<sup>38</sup>樓適夷形容夏氏工作的認真：「他給學生改卷子，一篇短短的作文，常常會整幾天的研究，直到自己認為改得完全滿意為止。」<sup>39</sup>學生對於夏丏尊凡事以身作則的態度甚為敬佩，陳仁慧說道：「他要我們作文時認真構思，字體要端正，卷面要整潔，他為我們批改作文，在這方面都是表率。我們的每篇習作後面，都有夏先生的一段評語，寫得端端正正，整整齊齊，一筆不苟，字句斟酌地給這篇習作恰如其分的評價。」<sup>40</sup>夏丏尊一絲不苟的教學態度，正如同他認真嚴肅的生活態度。

葉至善說：「在語文教學方面，夏先生幾乎花了畢生的精力。他當過二三十年國文教師，積攢了豐富的經驗，對語文教學有許多獨到的見解。」<sup>41</sup>夏丏尊在浙一師領導語文革新而獲得「四大金剛」的封號，雖因發生風潮而使得種種措施無法繼續，但他秉持在浙一師時的革新精神，到其他學校繼續實踐自己的理想，在語文教育史上可謂貢獻卓著。夏弘福對於祖父十分肯定，他認為夏氏：「能站在時代的高度，用批判的眼光去審視文化遺產和傳統的語文教學觀念，提出了超越時代，符合教育教學規律的新觀念。」<sup>42</sup>此評論可謂中肯。夏丏尊後來在編輯階段仍編寫許多有益於語文教育的書籍，這部分就留待第六章再行探究。

---

<sup>38</sup> 呂紹華：夏丏尊先生的長衫，同註 21，頁 29。

<sup>39</sup> 樓適夷：我和夏先生，《中學生》第 176 期（1946 年 6 月）。

<sup>40</sup> 陳仁慧：夏丏尊先生在南屏女中，收於夏弘寧主編：《夏丏尊紀念文集》（浙江：浙江省上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2001 年 10 月），頁 158。

<sup>41</sup> 葉至善：紀念夏丏尊先生，同註 40，頁 217。

<sup>42</sup> 夏弘福：我國現代語文教育家—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中學語文教學》（1995 年第 3 期），頁 5。夏弘福為夏丏尊的孫女，此段評論乃是針對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三人而發。